

唐昌泰 选注

三袁文選



巴蜀書社

唐昌泰 选注

三袁文選

己酉

一九八七年



责任编辑：周锡光

封面题签：许伯建

封面设计：梁永玲

三 袁 文 选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625插页3 字数200千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690册

ISBN7—80523—015—3/I·5 定价：2.80元

前 言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随解放大军来到举世闻名的荆州古城，看到巍峨的城墙，众多的名胜古迹，不禁心旷神怡。更引人注目是，东南城墙上三座身圆顶尖的砖塔，形如竖立的三管巨笔直刺青天（“文化革命”中被毁，现仿旧修复）。人们说这是纪念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的，名叫“三管笔”。离“三管笔”不远的东南城隅，有一座“公安门”（城门尚存），据说是为公安籍文人、官员进出府城而专修的。这些反映公安人才辈出的古建筑，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三年，我调到“三袁”故乡——公安县工作，从此，三十多年一直在公安这块土地上生活，对“三袁”的崇敬心情与日俱增，喜读“三袁”著作的兴趣有加未减。我曾经多次接触“三袁”后裔，瞻仰“三袁”故里——桂花台“天官府”、隐居处“柳浪湖”等遗址，并留心搜集“三袁”的著译著作和“一母三进士，南北两状元”一类故事。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三谢”（谢灵运、谢朓、谢灵运）等。

运、谢惠连、谢朓）、“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等“一门三文士”这一类文学现象。这些都是后世读者所称道的文坛盛事，因为他们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我们祖国的骄傲。公安“三袁”，是同父同母所生，三兄弟均为进士，又是志同道合的著名文学家和公正廉洁的清官，更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遗憾的是，在众多版本的古籍中，却没有见到有这三兄弟的合集。因此，我很早以前，便产生了一个着手搜集、整理“三袁”文学作品的愿望。但由于一九五七年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愿望未能实现。

严寒终于过去，文学的春天到来了。自一九七六年以后，很多古典文学的笺校本、选注本重新陆续出版了。我也自不量力，再次开始着手选注《三袁文选》的工作。但由于“三袁”作品数量浩繁，单传世的散文就有一千五百篇以上，如何选好篇目一系列问题便成了我长期以来考虑的中心。

“三袁”在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们在文学理论上提出的创见以及积极从事革新的功绩，这已为文学界所公认。从明代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长期统治文坛。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文学发展一代不如一代，说什么文自西汉、诗自盛唐以下，都无足观。甚至发展到“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歌诗人传》）的地步。至其流弊则是剽窃蹈袭成风，毫无生气。面对这一倒退逆流，在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以及稍后的徐文长等进步作家，都曾先后揭露过当时文坛的这一严重弊端，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

主张。但是，这些人或因带上浓厚的道学家色彩，或因理论不够系统，又寡不敌众，仍然没有动摇“七子”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到了万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里已孕育和发展着资本主义，叛离封建正统、反对假道学的思想逐渐形成潮流。

“三袁”正是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他们继承了同时代年岁较长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童心说”，创造了“性灵说”，向“七子”派的文学理论及其作品猛烈开火。在这一反

“七子”的战斗中，“三袁”始终互相配合。宗道长于论文，他在《论文》(上、下)两篇中，系统地阐述了散文发展的历史以及改革的必然趋势，批判了“七子”字比句拟的复古倒退论；宏道善于论诗，他在《叙小修诗》中，首次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成了“三袁”文学革新的旗帜，在《叙竹林集》、《雪涛阁集序》及大量的信札中，他又反复论述了诗文的改革，抨击了“七子”的错误主张；中道的文学主张不仅基本上与两个哥哥相同，还纠正了宏道某些矫枉过正之处，这些主张集中反映在《宋元诗序》、《中郎先生全集序》等文章中。实际上“三袁”从论战到文学创作都已形成了一个整体，并以“三袁”为核心，逐步形成了一个进步文学流派——

“公安派”。袁宏道被公认为这个流派的主帅。于是，“学者多舍王(世贞)、李(攀龙)而从之，目为‘公安体’”(见《明史·袁宏道传》)。连后“七子”的首领之一王世贞，到了晚年，文风也有了某些转变。至此，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的局面被以“三袁”为核心的“公安派”冲破了。

“三袁”的散文，突破了传统古文的陈规格局，自然地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而清新明快。在“三袁”的作品中，成

就最大的要算山水游记。他们几乎遍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观赏考察了文物胜迹。他们对风光景物，既独具慧眼，又能妙笔生花，行文自然流畅，别具风格。象宗道的《上方山四记》、《西山五记》，宏道的《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飞来峰》及《龙井游记》，中道的《西山十记》等，都不愧为古典文学中山水游记的佳作。

“三袁”不仅是一代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忧国忧民、公正廉洁的清官。从宗道的《救荒奇策何始》，宏道的《摘发世奸疏》、《上孙立亭太宰书》，中道的《寄祈年》等文中，即可看出他们的人品情操。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三袁”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时在作品中表现出彷徨苦闷的情调，产生了清高闲逸，寄情山水的思想。在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某些作品中，还反映了唯心主义的观点。

根据以上情况，我在选注“三袁”散文时，就以他们的文学理论和反模拟复古的功绩为主线，同时注意突出他们山水游记的地位，并适当收录反映他们政治抱负、人品情操的文章。至于对有争议或有明显缺点的作品，也将其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选入，让读者去鉴别，以便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三袁”。

“三袁”中又突出了宏道的主帅地位。本书选录共六十四篇。其中宗道文十二篇，宏道文三十五篇，中道文十七篇。每人为一章，大致按文体排列。

选文主要依据《白苏斋集》、《袁中郎全集》、《袁宏道集笺校》、《珂雪斋集选》、《珂雪斋近集》、《游居柿录》等文本。如有版本相异之处，则择善而从之。除此之外，本书

编选中还参考了目前古典文学散文选本中有关“三袁”的文章，吸取了其中的一些学术心得。感谢谈道新、王宗道、李寿名、袁子谦、李素华诸同志对本书编选工作的支持、帮助。特别是巴蜀书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在一九八四年五月接到我求教的信以后，对我倍加关怀，分工编辑周锡光同志多次来函指导和鼓励，耐心审阅初稿，并来到“三袁”故乡——湖北公安，作深入调查研究，具体指导我修改初稿，还提供有关资料，使我完成了这本《三袁文选》修改稿。感谢苏渊雷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题诗，老书法家许伯建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使这本小书大添光色。由于笔者水平低，错漏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唐昌泰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次修改于公安

目 录

前言.....	(1)
袁宏道.....	(1)
论文(上)	(4)
论文(下)	(9)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13)
答陶石簪.....	(20)
教荒奇策何如.....	(24)
封知县刘公墓志铭.....	(30)
岳阳纪行.....	(38)
游西山(三)	(39)
上方山(三)	(43)
大别山.....	(46)
嘉鱼纪游.....	(48)
锦石洲.....	(50)
袁宏道.....	(53)
叙小修诗.....	(56)
叙竹林集.....	(61)

叙梅子马王程稿·····	(64)
叙陈正甫会心集·····	(66)
雪涛阁集序·····	(69)
诸大家时文序·····	(73)
逍遥游·····	(76)
摘发巨奸疏·····	(80)
上孙立亭太宰书·····	(86)
乞改稿 (五) ·····	(89)
与李宏甫·····	(90)
与丘长孺书·····	(91)
与顾绍芾秀才·····	(93)
与汤义仍·····	(96)
与伯修 (摘录) ·····	(98)
与江进之·····	(101)
与张幼于 (摘录) ·····	(105)
又与冯琢庵师·····	(108)
答沈伯函·····	(110)
答李元善·····	(112)
徐文长传·····	(114)
识张幼于箴铭后·····	(121)
新修钱公堤碑记·····	(123)
虎丘记·····	(127)
晚游六桥待月记·····	(131)
飞来峰·····	(133)
莲花洞·····	(135)

五泄·····	(136)
天目(一)·····	(140)
满井游记·····	(142)
由水溪至水心崖记·····	(145)
华山别记·····	(150)
山居斗鸡记·····	(153)
场屋后记(三则)·····	(156)
瓶史引·····	(159)
袁中道·····	(161)
宋元诗序·····	(163)
淡成集序·····	(168)
袁中郎先生全集序·····	(171)
花雪赋引·····	(178)
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181)
关木匠传·····	(201)
寄祈年·····	(204)
答钱受之·····	(207)
与梅长公·····	(210)
柞林纪谭(摘录)·····	(211)
西山十记(选三篇)·····	(217)
塞游记·····	(222)
游君山记·····	(225)
玉泉闲游记·····	(229)
远帆楼记·····	(232)
游荷叶山记·····	(235)

旧记三则..... (238)

附录一

三袁年表.....王宗道 袁子谦(244)

附录二

袁中道生卒年小考.....唐昌泰(260)

袁宗道

袁宗道（一五六〇——一六〇〇），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人，明代文学革新派——“公安派”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与弟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并称“三袁”。他父亲袁士瑜是个诸生，在乡邑享有声誉；母亲龚氏，是进士出身河南左布政使龚大器（公安人）的女儿。四个舅父，其中一个是进士，一个是举人。宗道自幼聪颖好学，十岁能诗文。

袁宗道本姓“元”，他远祖从江西丰城元坊村迁到蕲、黄间（今属湖北东部），至宗道高祖元有伦于明代初年迁到公安长安里落籍。宗道十二岁应童子试时，一个金姓的督学看到他的试卷，惊奇地说：“子当大魁天下，但姓同胜国号，恐不利首榜，吾为子更之。”遂由“元”姓改为“袁”姓。宗道就在这次童试入学。从此，全家也就姓袁了（见清康熙《公安县志》、《袁氏族谱》）。原来，元朝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退出北京后，还在河套一代建立过“北元”国，屡犯明朝边境。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己巳（一四四九）发生了“土木之变”，明王朝五十万大军，被瓦剌贵族（蒙古族）也先军全部消灭，连英

宗皇帝也当了俘虏。因此朝野上下，更加忌讳“元”字。那个姓金的督学给元宗道改姓是有来由的。

明神宗万历七年己卯（一五七九），宗道二十岁，考中湖广乡试举人。回到家乡，他与弟宏道、中道肄业于荷叶山房，益喜读先秦两汉之书。当读到当时前后“七子”诗文时，他即已对其诗文之道产生怀疑。那时，他因体弱多病，常习数息静坐之法，栽花种草，无意仕途，后来在父辈及亲友的督促下，才又应试科场。万历十四年丙戌（一五八六）举会试第一，时年二十七岁。次年入翰林院，授吉士，进编修。

袁宗道的主要贡献，是他针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理论，“在馆（翰林院）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明史·袁宏道传》）。他先后发表《论文》上下二篇，批驳了前后“七子”及其应和者违反文学发展规律、倡导剽窃蹈袭、复古倒退的谬论。他认为作家应“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见袁宗道《论文》〔下〕）。作家要加强思想修养，钻研文学知识，随着历史的进步，各个时代自然有自己时代的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以及那一时代的通俗语言。这两篇论文，被公认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学理论著作，至今这种看法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虽然宗道在文学上反对模拟复古，但并不排斥学习前人，他说：“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他平生崇敬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文学家苏轼，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白苏斋”，诗文集取名《白苏斋集》。

万历十八年庚寅（一五九〇）春天，当时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到公安游览。早就仰慕李贽盛名的宗道，率宏道、中道等，到公安柞林潭庙中拜见了李贽，向他求教释疑。复于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一五九三），宗道又率宏道、中道两个弟弟，专程到麻城（今湖北麻城县）龙湖拜访李贽，再次求教问法。李贽蔑视礼法的进步思想对他们颇有启示。万历二十六年戊戌（一五九八），由宗道与宏道、中道共同发起，一批反复古主创新的作家、诗人黄辉、江盈科、钟君威、谢肇淛、方子公等参加，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前后“七子”复古倒退的文学主张及当时模拟剽窃的文风。在他晚年《答陶石簪》信中，已高兴地看到了“三袁”领导的文学革新运动大见成效，已出现了一些“新鲜矫警”的作品，而那些模拟剽窃“如书画赝本”的作品，则“几成滞货”。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七）八月，宗道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秋天，因过分操劳，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四十一岁。明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明末清初著名作家、诗人钱谦益在《袁庶子宗道》中写道：“其才或不逮二仲（宏道），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列朝诗集小传》）。

宗道除了论述文学革新主张的文章外，还写了不少忧国忧民的诗文和清新明畅的山水游记，又工书画。中道评他的“诗清润和雅，文尤婉妙”（《石浦先生传》）。从宗道的《救荒奇策何如》、《嘉鱼纪游》等散文，即可看出作者的人品情操及艺术风格。

宗道一生，科场显耀，为人忠诚。居官十五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因公积劳成疾逝世以后，“棺木皆门生敛金成之，检囊中竟得数金，及

妻孥归不能具装，乃尽卖生平书画儿砚之类，始得归。归尚无宅可居。其清如此”（本段引文均见清同治《公安县志·袁宗道传》）。

袁宗道的著作有《白苏斋集》二十二卷行世。

论 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1〕，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2〕，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3〕？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4〕。”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5〕。

唐、虞、三代之文〔6〕，无不达者。今人读古书，不即通晓〔7〕，辄谓古文奇奥〔8〕，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论谓奇字奥句〔9〕，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方言》谓楚人称“知”曰“党”〔10〕，称“慧”曰“谪”〔11〕，称“跳”曰“跢”〔12〕，称“取”曰“𢇛”〔13〕。余生长楚国〔14〕，未闻此言，今语异古，此亦一证。故《史记》五帝三王纪〔15〕，改古语从今字者甚多，“畴”改为“谁”〔16〕，“俾”为“使”〔17〕，“格奸”为“至奸”〔18〕，“厥田”、“厥赋”为“其田”、“其赋”〔19〕，不可胜记。

左氏去古不远〔20〕，然《传》中字句〔21〕，未尝肖《书》也〔22〕。司马去左亦不远〔23〕，然《史记》句字，亦未尝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数前汉〔24〕，不知几千年远矣。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中间历晋、唐，经宋、元，文士非乏〔25〕，未有公然扞扯古文〔26〕，奄为己

有者^[27]。昌黎好奇^[28]，偶一为之，如《毛颖》等传^[29]，一时戏剧^[30]，他文不然也。

空同不知^[31]，篇篇模拟，亦谓反正^[32]。后之文人，遂视为定例，尊若令甲^[33]。凡有一语不肖古者，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34]，不知空同模拟，自一人创之，犹不甚可厌。迨其后^[35]，以一传百，以讹益讹^[36]，愈趋愈下，不足观矣。且空同诸文，尚多己意，纪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衔，俱用时制^[37]。今却嫌时制不文^[38]，取秦、汉名衔以文之，观者若不检《一统志》^[39]，几不识为何乡贯矣^[40]。且文之佳恶，不在地名官衔也。司马迁之文，其佳处在叙事如画，议论超越，而近说乃云：“西京以还^[41]，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驯雅，虽子长复出^[42]，不能成史。”则子长佳处，彼尚未梦见也，而况能肖子长也乎？

或曰：信如子言^[43]，古不必学耶？余曰：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44]。今之圆领方袍，所以学古人之缀叶蔽皮也^[45]，今之五味煎熬^[46]，所以学古人之茹毛饮血也^[47]。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饱口腹，蔽形体，今人之意，亦期于饱口腹^[48]，蔽形体，未尝异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49]，投毛血于鞞核之内也^[50]。大抵古人之文，专期于“达”^[51]，而今人之文，专期于“不达”。以“不达”学“达”，是可谓学古者乎？

【简介】

宗道于明神宗万历十五年丁亥至二十五年丁酉（一五八七——一五九七），在翰林院任修撰。这篇《论文》（上）当作